

領獎不忘諫言 小思誓為港歷史存照

日前，在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的「2015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上，30個獎項分別頒發給舞蹈、戲劇、電影、文學、音樂、戲曲、視覺藝術及藝術評論領域等本地的優秀藝術工作者、團體、學校和機構。多位獲獎人在手握獎盃發表獲獎感言時仍不忘獻策獻計，號召政府與業界聯手，為保存整理香港文化藝術史料共同出力，站在堅實的地基之上，推動香港藝術發展不斷向前邁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倩

「終身成就獎」的獲獎者是香港文學研究工作者盧瑋鑾（小思）。藝術發展局希望藉此獎表彰小思多年來為香港文學和文化資料傳承所作出的持續努力與傑出貢獻。五十多年裡，小思默默收集了三百多位香港作家的相關資料，其中包括研究香港文學的原始檔案、文獻及書刊。但為了方便研究人員鑽研香港文學和文化，小思2002年將這些來之不易的珍藏悉數捐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並先後創建「香港文學特藏」和「香港文學資料庫」。

「香港文學資料庫」現已成為目前香港文學文化最重要的資料庫，年均點擊率高達450萬次，小思的無私付出正漸漸顯現成效。當日作為頒獎嘉賓，一頭白髮的著名作家劉以鬯，雖連從座位起身行至舞台中央均頗為艱難，需由太太在一旁攙扶才能緩慢前行，可為了表達對小思的肯定，將獎盃傳予其手，每一步都走得態度堅定。而小思上台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背對觀眾，面朝劉以鬯夫婦深深鞠躬，感謝兩老對她的支持。她的這一舉動及隨後發表獲獎感言時一番發自肺腑的倡議，令在場的每位觀眾都為之動容。

保存史料需團隊力量

小思除了常常強調文學資料外，亦指香港還有很多可反映社會發展及文化變遷的史料需要被挖掘並保護，她說要代表現在及未來那些正在或將要從事歷史文獻收集工作、歷史研究的人道謝。這句多謝不是因為自己得獎，而是在當下如此忽視歷史的香港社會裡，這個獎可以讓其他默默耕耘的人感受到希望。她說：「講到歷史，很多人以為是滯後的、懷舊的、沉悶的、可以被廢棄的。但其實任何人、事、物都有歷史。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即如果我們能夠讀通歷史，就會明白前人的來路艱難。總結得失成敗的教訓不再重蹈覆轍，體現了我們作為後人的前瞻性。忘記歷史的話，我們無法在前人的辛苦經營之後，大步邁向安全平實的道路。」

本身亦已77歲高齡的小思近年來還在不斷訪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作家，用口述歷史的方



「2015香港藝術發展獎」眾嘉賓及藝術工作者大合照。



「終身成就獎」得主盧瑋鑾（小思）。

式盡最大努力去為香港歷史存照，從未言休。儘管小思表示，搜尋資料並將其收藏是她生命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由於一直都在做自己最愛做的事情，所以沒有退休一說。但她也盼着，有更多人可以加入這項事業。研究的形式多種多樣，不是非要人人當學者寫碩士論文、博士論文才算是做研究，有時候玩票性質亦無妨。只要玩下去，好奇心會驅使參與者不斷去挖掘真相，其實人人都可以做到。「我畢竟已經七十多歲了，歷史收集工作不應該由一個人來做，它需要團隊的力量。這次獲獎正好可以向在做同樣或者類似工作的人證明，他們的工作有人賞識，更有機會獲得肯定。我不能說自己作出了最



洛楓



由余仁華編舞、徐奕嫻與舞蹈員琴曾頤演出的《余仁華·零次方》選段。

趙倩攝

大的貢獻，因為只不過是開了個頭，能夠讓其他年輕人都知道，有一條路可以這樣走下去。」小思語重心長道。

搶救消逝的表演藝術

與文學作品出版或發表後相對固定的形態相比，表演藝術正以更快的速度在消失。落幕熄燈後，曾經璀璨奪目、精彩紛呈的舞台藝術便杳無蹤跡。因此，今年藝術家年獎（藝術評論）得主洛楓（陳少紅）代表個人及香港表演藝術界的藝術工作者，建議政府資助一本涵蓋舞蹈、戲曲、戲劇、音樂各範疇的紙本表演藝術評論雜誌，對表演藝術作品進行分析與評論，在刺激創作，提升作品水準的同時，讓本身就是文獻之一的藝評為表演藝術儲存歷史記錄。不容否認的是，籌建表演藝術資料館，搶救比文字、電影、視覺藝術更易散失的表演藝術已刻不容緩。洛楓指出，香港很多傑出的表演藝術家均年事已高，如果繼續拖延，恐怕日後會是江心補漏——為時已晚。希望表演藝術資料館計劃可以和東九、西九文化藝術區同步啟動，至少抓住未來本土表演藝術發展的重要節點。

今年傑出藝術貢獻獎獲獎者，正是因擅長飾演各類角色而被稱為「萬能泰斗」的著名粵劇藝術家阮兆輝。他不但在推動粵劇的創新方面不遺餘力，而且在留存傳承舞台技藝方面身體力行。為了將自己六十餘年寶貴的舞台經驗傳予後人，長期以來反覆重申學與術結合的重要性的阮兆輝，去年和香港教育學院聯手攝錄DVD及編寫文字教材。在《粵劇生行身段要訣：電腦化自動評估與學習系統發展計劃》中親身示範，講解粵劇生行身段要訣，並且與時俱進，採用先進的電腦3D肢體感應技術進行教學，透過科技為傳承及教學帶來新突破。阮兆輝表示，常言道：「做一行，厭一行」，但時至今日他仍舊熱愛粵曲如往昔，將做「生行」的知識錄下來是為了幫助下一代有系統有程序地學習「生行」技巧。

文化藝術絕不是「玩」

本港著名粵劇藝術家阮兆輝在談及傳承話題時提到，希望香港社會能夠重視文化藝術的內涵。因為「名與利」只是外在，文藝才是我們的內涵。他說：「在校際比賽中我們難得發現了天才，卻沒辦法將他們持續培養成優秀的藝術家，真的讓我很心酸。因為中四、中五的學生家長會對孩子說，抓緊學習，不要再玩了。不斷流失的天才，我們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回來。」聽到學生家長這麼說，阮兆輝意識到原來大量港人僅把追求藝術理想當成休閒玩樂。「這真的令我很傷心，我們在藝術世界中一生的奮鬥真的不是在玩。做藝術不是浪費時間，只要用心和努力，你所花的每分每秒都會有回報，所謂的回報就是你的內涵。別人或許未必能見到，但你自己心裡清楚，你會很開心。」阮兆輝強調，「當然我不是批評政府，但我從見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這八個字起的第一天，就在問為何會取這個名字，可是做顧問這麼多年都沒有結果。我請大家幫幫忙，從換個名字開始，不要當文化藝術是玩。」



「傑出藝術貢獻獎」得主阮兆輝。

席慕蓉回鄉誦詩談老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 圖們、通訊員 邊建平 內蒙古報道）日前，著名蒙古族詩人、畫家席慕蓉在內蒙古師範大學盛樂校區報告廳舉辦了主題為《詩與原鄉》的演講。

席慕蓉表示：「自1989年首次回到老家內蒙古到現在，已經27年了。我有一個感覺，在老家演講和台灣不一樣，我不再用去介紹、解釋。因為這裡是我的，這裡是我的土地。」演講期間，席慕蓉曾數度哽咽，並告訴大家，因為她回到自己的家鄉了，放鬆了。當與學生互動時，席慕蓉談到她一首名為《鹿回頭》的詩，她介紹這是她當年在鄂爾多斯草原看到一把3,000多年前製造的青銅刀時的靈感。「有人問過我，你年輕時候寫了好多關於感情的詩，怎麼中間改寫蒙古高原了？其實，我沒有轉變，我是在心裡面把我遇見的事情記錄下來。蒙古高原本身的存在就會讓我們心安。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後僅存的人類的原鄉之一了。現在的人們一想到原鄉就覺得那是要被開發的，還有人在乎心安嗎？還有人在乎記憶嗎？新世紀已經開始十幾年了，好像沒有人願意明白，草原不是人可以衡量的，草原就是你的一部分。」

席慕蓉說，她還是很喜歡台灣的，因為台灣對她是幾十年的溫暖。她小時候確實很難過，覺得自己是流落在外的蒙古人。1989年，她第一次回到故鄉時，遇到許多感動的事情。之後，她多次講給她台灣的朋友聽，她在故鄉只有不認識的親人和第一次見面的朋友，還不知道將來會有怎樣的發展。她總是想告訴她們她的原鄉是什麼樣子的，只有跟親近的朋友說了之後，她的原鄉才站出來、穩定、成



席慕蓉（右）朗誦詩《交易》。

型，才進到她的心裡面。也有人問過她，既然她這麼熱愛蒙古高原，為什麼不在那裡定居呢？「我怕冷。」她直接了當地回答。

寫詩解寂寞

席慕蓉演講後，緊接着在內蒙古成吉思汗陵與當地文化界人士座談180分鐘。其中一名作家請席慕蓉談對成吉思汗陵印象時，她回憶起自己與成吉思汗陵的感情，以及作為蒙古人對祖先的感情。席慕蓉說：「這裡是『聖地』。回想起自

己第一次踏上成吉思汗陵時的心情，身體裡有一種感覺，跪下來、跪下來向祖先說，這個孩子回來了。之後每一次來到這裡，來到蒙古高原，心裡總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心裡平安，即便是在森林裡迷路也不覺得害怕。我時刻告誡自己，我是去過成吉思汗陵的人，我是在祖先面前磕過頭的人，所以不能變壞……在祖先面前我們是非常渺小的，在土地面前我們是非常渺小的，在大自然面前我們是非常渺小的……」

一作家問席慕蓉：「你為什麼學美術專業、為什麼寫詩？」席慕蓉笑稱，學美術是因為數學不好。戰亂出生的她，沒有固定的朋友，初二插班、之後多次轉學，一名老師送了一本日記本，她便開始寫詩。在談到為何寫詩時，席慕蓉說，是因為寂寞。



席慕蓉日前在內蒙古與當地文化界人士座談。

走東走西

史翠珊效應

美國歌星、演員巴巴拉史翠珊於二零零三年控告一名攝影師及其圖片網頁侵犯隱私，將一批從高空拍攝到的加州海岸照片擺放上網。因為照片裡，有她的豪華巨宅全貌。她要求法庭頒令將這些照片移除。法庭判處巴巴拉史翠珊敗訴，事情發展下去，結果適得其反：她的豪宅引來更多人上網瀏覽，每月多達四十二萬人次。



巴巴拉史翠珊的禁制令變成歷史名詞。

兩年後，一個名為「史翠珊效應」(Streisand Effect)的名詞正式被使用，意謂某些社會名人試圖控制或壓制特定的網絡信息，反而令該事件更廣為人知，即欲蓋彌彰。在今天的互聯網世界裡，網絡信息分享是新生現象，禁無可禁。例如：二零一一年英國曼聯球星傑斯(Ryan Giggs)的婚外情被踢爆，他向法院申請「超級禁制令」禁止媒體報道，結果也是弄巧成拙，關注此事件的人數急劇上升。

最近又發生一樁轟動全球的「史翠珊效應」事件。三名娛樂界紅人大被同眠，其中兩人屬夫婦關係，第三者是男性。三人於今年一月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媒體洩露他們的身份。該對夫婦更強調，他們的子女年幼，會傷害到孩子，但美國、加拿大、瑞典和蘇格蘭都以出版自由為由，公開了三人姓名，而英格蘭的法庭卻強調，任何人均享有保護隱私和維護家庭生活的權利。倘若媒體違反此禁制令，或網上發表對案中三人的意見，均會觸犯蔑視法庭罪。結果直到四月中，英格蘭媒體仍然不能報道此案，激起國內朝野軒然大波。英國國會議員批評法官「堅離地」，不了解現今的網絡世界；他們呼籲法官重新認識社會真實的一面。最令英國媒體氣憤的是，此新聞「人有我

有」。《太陽報》認為，生活在數碼年代和全球化世紀裡，根本沒界限可言。美國媒體已經刊登的消息，全世界報紙都可以刊登。況且，任何國家媒體都享有出版自由。《每日郵報》指出，申請禁制的案中夫婦，若擔心事情會傷害子女，他們應該早在「三人大被同眠」前考慮到孩子。《衛報》更直斥此案荒謬無稽，該報引述一宗發生於一九八五年的案件為例：原任職於英國軍情五處(MI5)副處長的情報員賴德(Peter Wright)，工作了二十年後退休，移居澳洲寫自傳《捉間諜者》(Spy Catcher)，書中大爆軍情五處內幕。英政府向澳洲法院提出訴訟，禁止賴德的自傳出版。

翌年此書已在美國出版，但英國法院依舊維持其臨時禁制令。當時，有許多人從美國將該書帶回英國，在公眾場所閱讀和廣泛傳閱，直到一九八八年此禁令始被撤銷。當年爆出此宗新聞的就是《衛報》。該報強調，公眾有知情權，媒體則有出版自由。可惜直到今天，英國的法院仍然「食古不化」。當然，「三人同眠」一案與「捉間諜」一案不能相提並論，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全球化下無國界，「史翠珊效應」下只會欲蓋彌彰。